

斯图尔德及其文化人类学理论

石奕龙

斯图尔德 (Julian Steward) 1902年1月31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市,并在那里长大。其父亲在专利局工作,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箴言派教徒。

1918年,斯图尔德16岁时远离父母到加州深泉预备学校 (Deep Springs Preparatory School) 就读。在那里,他有机会认识了印第安人中的肖肖尼人 (Shoshoni) 和派尤特人 (Paiute)。斯图尔德后来对他们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深深地影响到他所建立的学说。1921年,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间他学习了克罗伯 (Alfred L. Kroeber)、洛伊 (Robert H. Lowie) 和爱德华·温斯洛·吉福德 (Edward Winslow Gifford) 等开设的“人类学概论”课程。1922年,他转学到康奈尔大学。由于当时美国只有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人类学系和研究所,康奈尔大学只在社会学系中有人类学课,所以他很失望,只好主修地质学和动物学,于1925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由于他在大学四年级时就立志要学人类学,所以康奈尔大学的校长、人类学家利文斯顿·法兰德 (Livingston Farrand) 建议他在大学本科毕业后,仍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一步学习。因此,他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研究所,师从克罗伯和罗维学习人类学,并师从卡尔·索尔 (Carl Sauer) 学习人文地理学知识。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由于克罗伯要求学生兼顾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所以斯图尔德也受到人类学知识的严格训练。同时,他也利用几个暑假,在哥伦比亚河、欧文斯峡谷从事考古和民族志研究,他发现莫诺 (Mono) 印第安人虽没有种植与耕作,但却有系统的灌溉野生植物的做法。在1939年之前,他写了不少有关考古人类学的论文,这些论文对他后来建立的文化变迁理论有着很深的影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他继承美国历史学派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选择高中时就认识的肖肖尼人作为研究对象。这时他也对克罗伯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根本分歧与差异在于,斯图尔德认为研究文化应探究其因果关系,而克罗伯则认为因果关系难以掌握,不适于人类学中的文化研究。

1928年,斯图尔德开始利用图书馆的资料撰写题为《美洲印第安人的仪式性丑角》的博士论文,并且先到密歇根大学教了两年人类学课程,这是密歇根大学首次开设人类学课程。1929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并获得加州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怀特 (Leslie A. White) 接替斯图尔德在密歇根大学的教职,斯图尔德则转到犹他大学任教。在那里,他教了三年书,并从

参见郑金德:《人类学理论发展史》(第二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97页。

参见 美 哈齐著,黄应贵、郑美能译:《人与文化的理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事美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发掘,后来还参加克罗伯主持的研究计划,调查大盆地的肖肖尼人、普埃布洛人(Pueblo)和沙漠中的考古学文化遗址。1933年,斯图尔德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任讲师。1934年他同琼·坎南(Jean Cannan)结婚,并一起从事对肖肖尼人等的研究。

1935年,斯图尔德成为史密森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e)美国民族学事务局(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的人类学家,参加史密森学院美洲民族学部的工作,在印第安事务局委员约翰·科勒(John Collier)手下从事人类学研究,并对厄瓜多尔、秘鲁高原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卡列尔(Carrier)印第安人做过短暂的田野调查。1940年,他在史密森学院建立了社会人类学研究室,并兼任该室主任。1943年,该研究室升格为社会人类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斯图尔德任所长至1946年。在此期间,他主要从事社会文化变迁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训练了一些人类学家到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等地做复杂社会的研究与教书。1946年他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接替当时去耶鲁大学任教的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的职务。1947年到1949年,他与波多黎各大学合作主持一个关于波多黎各的研究计划,该计划把波多黎各放在一个较大的经济、政治环境中,从生态、历史等角度来研究这一复杂社会的各种社会制度,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研究中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斯图尔德自己没有去调查,而是由他的研究生罗伯特·曼内斯(Robert Manners)、悉尼·明茨(Sidney Mintz)、埃琳娜·帕迪利亚(Elenam Padilla)、雷蒙德·谢勒(Raymond Scheele)、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等去波多黎各调查,后于1956年出版《波多黎各人》一书。

1952年,他获得人类学研究温内格仁基金会颁发的“瓦伊金”(Viking)奖章。同时,由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工作太繁重,6年中指导了35篇博士论文,加上身体不适,所以他决定转到伊利诺伊大学任教,在那里的社会学系任研究教授,工作比较轻松些。1954年,他被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的院士。1956年,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率领11位研究生在世界许多地方从事田野工作,研究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问题,其成果在1967年出版。1959年,他成为伊利诺伊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第一批成员。1956—1957年,日本政府邀请他担任京都美国研究会主任(Director of the Kyoto American Studies Seminar),使他的眼界扩展到了日本和东方。1960年,斯图尔德同奥斯卡·刘易斯和约翰·麦克里格等一起将人类学专业从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中分离出来,建立了该校的人类学系,并使该系成为美国培养人类学家的重要基地之一。1967年退休后,他成为伊利诺伊大学的名誉教授。由于他的成就,1969年伊利诺伊大学以他的名字命名该校的人类学杂志,即《斯图尔德人类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Steward Anthropological Society*)。1972年2月6日,在过完70岁生日后的第6天,他在伊利诺伊州厄巴纳(Urbana)的医院中与世长辞。

斯图尔德一生的著述颇丰,主要有:《美洲印第安人的仪式性丑角》(1931年)、《西南社会的生态观》(1937年)、《高原盆地土著的社会政治群体》(1938年)、《(大盆地)山区的土著文化》(1940年)、《南美印第安人手册》(1946年)、《地区研究:理论与实践》(1950年)、《水利文明》(1955年)、《波多黎各人》(1956年)、《种植园的前景》(1957年)、《传统社会的现代变迁》(1967年)、《阿尔弗雷德·克罗伯》(1973年)等。而斯图尔德的最重要著作则是《文化变迁的理论》,以及在他过世后由他的太太琼·坎南和学生罗伯特·墨菲(Robert F. Murphy)为他

参见叶春荣:《文化生态学的倡言人——史都华》,载黄应贵主编:《见证与诠释》,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第182—189页。

编辑的《进化与生态学》(1977年)论文集,因为这两本书阐述了他的主要理论见解。

一、人类学是一门科学的、研究人类文化共性的学科

在斯图尔德之前的美国历史学派强调用当时的历史方法研究人类的文化,认为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发生的。用斯图尔德的话来说:历史学派“对演化论与科学的功能论之反动,已非常近似于否认规律的存在;亦即宣称历史永远不会重复。虽然理论上承认原因与结果作用于文化现象中,但在特殊的个例中提及因果性却被认为太过急躁,更不用说提及‘法则’了。重点皆集中于文化的差异性、独特性与特殊性;而文化经常被看成若非凭空发展而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原因,不然就是出现时已发展完全”。换言之,在历史学派的垄断下,美国人类学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全部否定文化发展有规律性和共性,而只注重文化及其发展的差异性、独特性和特殊性,只注重描述个体文化的面貌和发展历程,而不去探究与解释文化发展中体现出来的共同的因果关系。因此,美国历史学派的人类学研究几乎都是人文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

在斯图尔德看来,人类各种文化的发展虽然是平行的,但绝对不是每种文化的发展都是独特的,而是在一些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现象,存在着许多一再重现的事物、形式、功能,乃至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因果关系或规律,它们“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重复出现”。正是由于“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重复出现”的事物的存在,而且同一类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也必有其共同的原因,因此,人类学的任务“必须具有精确的方法将它所处理的有重现性的现象加以确认与分类”,发现与归纳文化类型,发现与归纳某种文化变迁的因果关系或规律。斯图尔德认为,人类学是一门研究文化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性的学科,其目的主要应该是“探求在属于不同文化区的社会之间一再重现的各种形式、功能与变迁上的规律”。

同时,斯图尔德也清醒地看到,在他那个时代存在科学的和历史的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他认为:“从事文化研究必须认识到科学的、一般化的研究途径与历史的、特殊化的研究途径之区别。前者企图将一群现象置于秩序井然的一套范畴之中,探求这些现象之间的必然关系,建立现象的规律性的法则,并进而从事预测。后者则着重于现象发生时各自的时空背景,各现象与其时空背景构成的独特性,以及刻划不同文化区(culture areas)的社会思潮或价值体系。”但他指出,这两种研究途径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应该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科学性。他认为,作为科学的人类学应该“用一种历史的与比较的研究途径来研究文化。其目标有二:描述世界上的各个不同文化与解释不同文化的发展”。换言之,在涉及一种特定的文化时,应该用历史的方法来描述它的独特性,把该文化的独特性揭示出来,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通过比较的方法来探求其发展的规律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异同。也就是说,对一种文化来说,其面貌与发展是独立的;而对人类所有文化来说,则具有一些共性与规律。在这里,共性与规律才是斯图尔德科学人类学的主要目的。

为了探究文化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或规律,斯图尔德特别强调比较的方法。他指出,

美 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84年,第214页。

同上,第6页。

同上,第28页。

同上,第5页。

同上。

“规律性的发现必须利用比较法”，并认为比较的方法有同时限（synchronic）的与异时限（diachronic）的两种。他说：这些“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重复出现因而构成跨文化的（cross-cultural）规律性的那些文化模式与因果关系可以用同时限与异时限两种方法来探讨。在某些个例中，数群现象一再同时出现是因为其中的若干现象需要其他现象作为先决条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功能性的，勿需顾及历史的变迁、时间的深度或发展的过程。这种规律是同时限的。而在其他的个例中，数群现象规律的接续出现乃是因为发展的法则使然。这些发展的规律是异时限的，所以需要述及其过程”。也就是说，通过同时限的跨文化比较，可以了解同时存在的文化的异同，由此可以归结出文化类型，进而寻求文化构成的规律；而通过异时限的比较，我们可以了解文化发展、变迁的轨迹与规律。由此可见，在斯图尔德眼里，人类学不是人文性的文化研究，而是一种科学性的文化研究，其主要目的是探索文化发生、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一种对人类文化共性的研究。

二、多线进化的进化理论

为了研究文化发生、发展、变迁的规律，斯图尔德认为，进化论是对文化加以解释的最佳理论手段。而在他那个时代，反进化论的浪潮已支配人类学界太久了，以致对真正的社会科学和科学的人类学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因此，斯图尔德站出来提倡进化论，提倡因果关系或规律的研究。他与怀特一样都认为，文化人类学的中心目标应该是发现随时间的推移而体现出来的文化发生、发展、变迁的规律，因此，应该注重对文化的变迁与进化的研究。

但是，20世纪30年代斯图尔德在提倡进化论时，却提出一个与怀特不同的观点。斯图尔德认为，在研究文化发生、发展、变迁的规律时，有3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单线进化论（unilinear evolution），这是19世纪的古典进化论者如摩尔根（L. H. Morgan）、泰勒（E. B. Tylor）等倡导的。他们认为人类的“所有社会都通过相似的发展阶段”，都会经过从野蛮到文明的必然进化阶段，不同的社会只是处在不同的进化阶段而已。也就是说，各民族的发展道路是一样的，但是各民族由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显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他们的观点虽“包含许多可贵的洞见”，结论也“可能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错误与问题。

其二是普遍进化论（universal evolution），这是指怀特和蔡尔德（V. G. Childe）的进化论。斯图尔德认为，怀特关注的是全人类的文化而不是个别文化，注重的是从简单到复杂进化的大方向，怀特的进化论的次序或阶段适用于所有的文化，与古典进化论的说法没有重大的差异。怀特把文化看成一个以技术、经济为基础的技术体系、社会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三层结构构成的实体。在这种文化实体中，技术体系决定社会体系和意识形态体系。而世界上各种文化出现的差异在于能量的控制方面，哪种社会文化控制了较多的能量，或有更高的获取能量的效率，那种社会文化就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斯图尔德认为这种普遍进化论太笼统而且含糊，“只是指出‘文化会变，任何文化都会变’这一事实，因而不能解释任何特殊文化的特有性质”，也

美 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第105页。

同上，第6页。

同上，第5页。

参见 美 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第20页。

无法解释广泛分布在各个地理区域、顺序上平行发展的结构差异和类似之处,无法解释一些特定文化的变迁发展史。因此,他认为怀特的进化论虽然没有错,但在进化论中,“不易招惹批评但也不具有多大用处”的就是怀特的普遍进化论了。

因此,斯图尔德提出了第三种理论,即多线进化论(multilinear evolution)。他说:“多线演化基本上是一套方法论,其根本假设是文化变迁有其规律,因此它关注文化法则的测定。它的方法是经验性的而非演绎性的。它不可避免的也关心历史重建的问题,但并不期待历史资料可以分别归类于各个普同的阶段。它的兴趣在于个别的文化,但其目的不是要从地方性差异的发现而将参考架构由特殊性转为一般性;它只处理一些在形式、功能与发生序列上为数有限但具有经验上之真实性的平行现象。它虽然不能顾及普遍性,但却显得无比的具体与精细。因此多线演化没有任何先验的体系或法则。它承认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可能具有完全的、或局部的独特性,它只要问某些文化之间是否存在任何真正的或有意义的类似之处,以及这些类似之处是否可以归结出来。”

但实际上,斯图尔德未曾详细讨论多线进化论的方法论,也不曾告诉我们多线进化论的详细情况。他只是认为,多线进化指的是:文化的基本类型在类似的技术与环境的关系条件下,可能以类似的道路发展,但文化的具体方面却不会以单一发展规律的顺序出现于人类的一切群体中,而是可能出现多线性。因此,变迁或进化在它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而多线进化论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世界各地平行发展的文化变迁或发展的历史顺序的实证分析,以论证类似的关系与历程产生类似的结构。也就是说,要从各种单一特定的文化在它们的区域中的发展过程,来比较其类似性或寻找文化类型及其规律性。换言之,我们所看到的是各地平行发展的个体文化,它们的进化历程有可能有类似的规律,但总体上讲是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规律或因果关系的;而可能是有多种进化路线,也就是平行发展着多种文化进化路线。当然,这里的“多种”并非指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立的进化路线,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文化发展规律也是类似的。换言之,一种文化类型中的个体文化,因其有类似的情况,因而其发展、变迁的规律是类似的。

在《复杂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因果性与法则》一文中,斯图尔德比较了一种文化类型的情况,这种文化类型是由世界上几个独立发展出的古代文明构成的,如中国、埃及、两河流域、秘鲁与中美洲。他对这5个地方的古代文明进行论证,证明它们是“以相似的方式解决相似的问题”,经历了“相同的发展过程”,因而它们也有基本相同的进化阶段。他认为,这些地方进化的不同时期为:(1)狩猎与采集;(2)雏形农业;(3)形成期(乡民社区至国家);(4)区域性的繁荣国家;(5)初期的帝国;(6)黑暗时代;(7)循环性的帝国征服;(8)铁器时代的文化;(9)工业革命。斯图尔德还指出,这些地方环境都是干燥的或半干燥的,但是,环境并没有限制文化的发展,而是刺激了文化的发展。因为这些地方的雨量与洪水会带来冲积土,与森林地带或其他地带比较起来,这种地带更容易发展农业,即便不使用金属工具,这种土壤也可以且容易耕种。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增长,由此造成可耕地不足的矛盾,而这些地方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又都采取同样的解决方法——水利灌溉,因此在这些文明的摇篮中产生了类似的进化过程。

参见 美 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第23页。

美 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第24页。

参见 美 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第222—225页。

实际上,在这一方面,斯图尔德的理论深受威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水利假说”(hydraulic hypothesis)的影响。斯图尔德是在1946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书后,才同威特福格尔结识并深受其影响的。斯图尔德说:当文化史学家强调文化差异时,威特福格尔提出一个单一的基本因素来解决所有文明产生的问题。这个单一的基本因素就是水利灌溉。威特福格尔的“水利假说”的主要观点是:水利的发展需要大量人力,这将导致中央集权的出现。而斯图尔德的论点则是:在类似的环境条件下,运用相似的技术和利用相似的生态资源,就可能会产生出相似发展的社会文化结构以及变迁规律。当然,斯图尔德在这里只是列举了一种社会文化类型的进化路线而已,别的环境与技术的配合,其社会文化进化所遵循的可能是另一种进化路线,这才是斯图尔德所说的多线进化论的真正意义。

此外,在探索社会文化的结构与变迁进化的过程中,斯图尔德将社会文化组织视为一种相对持久的形式,并用“社会文化整合层次”(levels of 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来命名它。斯图尔德认为,核心家庭、部落(或俗民社会或社区)和国家为三种不同层次的整合形式,亲属与经济、宗教以及官僚机构等是这三种不同层次各自的整合力量。例如肖肖尼人没有固定的村落生活,核心家庭是最常见的生活单位,因此,肖肖尼人社会是一个在核心家庭层次上进行社会文化整合的社会。国家层次的社会文化整合在质量上不同于核心家庭层次与俗民社会层次的整合。“国家整合层次是以若干新模式的出现为特征,无数多家庭的聚体或俗民社会,即凭借这些新模式在一个大的体系中建立功能性的互相依赖。”因此,斯图尔德实际上是以社会文化整合层次的概念来划分不同的文化结构。但如果我们从历时的角度去看待这三种不同层次的整合形式,它们似乎也可以构成不同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斯图尔德也有这样的想法,如他曾认为,“核心家庭、俗民社会与国家,这三者是性质独特的组织体系,代表任何发展连续体中接续的阶段,也构成高级社会文化体系中不同类型的文化成分”。由此看来,在斯图尔德的方法论中,“社会文化整合层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用这个概念可以把所有的人类社会加以排比分类,然后加以比较,甚至也可以由此推演出文化发展变迁的阶段来。

三、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由于斯图尔德提倡文化进化发展的多线性,即各种文化在其特定的环境中的适应与发展,也认为在类似的环境和类似的技术水平的相互关系中可能产生出类似的结构与变迁过程,即“在类似的环境中采取类似的适应过程所造成之跨文化的规律性”,因此,他非常重视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提倡文化生态学。

在斯图尔德看来,文化生态学是“一项方法论上的工具,以确定文化对其环境的适应将如何引发若干变迁”。因此文化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也就是研究土地、自然资源等自然条件与技术、经济等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所造成的不同文化之异

参见 Steward, Jane C. and Robert F. Murphy, *Evolution and Ecology: Essays 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7, p. 88.

参见叶春荣:《文化生态学的倡言人——史都华》,载黄应贵主编:《见证与诠释》,第197页。

美 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第66页。

同上。

同上,第7页。

同上,第52页。

同和变化的学问。例如当一群人利用某种技术而取得某种自然资源时,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分工合作的模式。这种分工的模式会自然而然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居住规则、婚姻形式、社区大小等等社会组织形式。因此,自然条件与文化之间也就产生了一些对应的关系。正如斯图尔德所指出的,一种文化的面貌与变迁,可以从这种文化对其所处的特定环境的适应(adaptation)得到解释。

斯图尔德说:文化生态学所呈现的问题主要是人类社会对其环境的调适,究竟是需要一套特殊的行为模式,还是在某种范围之内好几套模式都可以适用。他认为,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由文化核心的基础——技术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特定适应过程——引起的。这种特定的适应过程主要指满足人们基本生存的自然资源和人的生计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环境决定论。例如他说:“技术在每一个环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而也导致不同的社会性后果……布须曼人(Bushmen)、刚果的尼格利陀人(Congo Negritos)、澳大利亚人(Australians)、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火地岛人(Fuegians)等,这一类社会之所以由父系族群组成,事实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类似的环境——布须曼人、澳洲土著与南加州的印第安人居于沙漠,矮黑人居于雨林,而火地岛人居于冷而多雨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的猎物有相同的特性,因而他们有相同的生计问题。”换言之,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并不是地理决定论或环境决定论,而是一种以考察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学问或方法。

斯图尔德在其文化生态学理论中,特别提出“文化核心”(cultural core)概念。斯图尔德说,文化核心是“与生产及经济活动最有关联的各项特质之集合,实际证明与经济活动有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与宗教模式皆包括在文化核心之内。其他无数的特质则可能有非常高的变异性,因为它们与文化核心没有太多的相关。这些特质可称为次要特质(secondary features),主要是受纯粹的文化—历史因素所决定,如传播或无意的创新;就是这些次要特质使具有相同核心的各文化显现出各自的独特性。文化生态学最关注的特质是经验性分析显示在文化规定的方式下与环境的利用最有相联者”。也就是说,文化核心是文化中与适应及利用环境最直接相关的部分,它包括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其中以技术经济最为重要。因此,当讨论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时,环境及技术水平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换言之,在斯图尔德提出的文化核心中,技术—经济是占基础地位的。正因为他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以技术—经济为基础的,所以他也认为变迁、进化的决定因素是技术—经济。因此,他在构拟文化生态学的方法步骤时,首先注重的是技术—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他认为文化生态学研究方法的步骤有三:第一,必须分析生产技术或开发技术、工艺技术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因为生产技术虽包括在通常所谓的物质文化中,但并非所有的物质文化特质都具有相同的作用。斯图尔德认为,在物质文化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技术,这是指维持人类生存的经济活动,所以首先需分析生产技术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第二,必须分析用具体的技术手段在开发具体地区时所涉及到的行为模式。这里重要的是弄清同样一种生计手段有哪些不同的表现方式等问题,因为“若干生计模式对一般的生活方式加上了非常严格的限制,而其他的生计模式则允许生活方式有大幅度的变化余地”。第三,必须弄清开发环境所涉及的行为模式影响文化的其他方面所具

参见 美 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第 45 页。

美 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第 46—47 页。

同上,第 45 页。

有的作用到底到什么程度。这就涉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的关系和问题。

这些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用斯图尔德对肖肖尼人的研究来做说明。肖肖尼人住在有着沙漠、半沙漠区和森林区的美国西部大盆地的地区,该地区的环境极为恶劣,冬天非常寒冷,夏天则又热又干燥,并不适于农耕。在这个区域中,他们能获取的食物有兔子或者其他小动物,以及野菜和松果等,但收获则很不稳定。肖肖尼人的生产工具非常简陋与原始,弓箭是他们的武器。在这样的生态条件下,“平均值是二十到三十平方英里有一个人”,不仅人口稀少,而且为了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人们需要时常移动,到处觅食,以男的打猎、女的采集这样分工的生计模式来生存。一年到头常常只是一个家庭的人住在一起,构成一个小群体而已,这是因为那里贫瘠的自然环境无法支持许多人住在同一个地方。只有在松果或鱼比较多时,才会出现有几个家庭暂时住在一起的现象。由于自然资源及技术条件的限制,肖肖尼人只能发展出个人化的经济活动。女人采集松果或草莓,只需一个人就可以;男人外出猎杀兔子等小动物也只需一个人行动。这就导致肖肖尼人缺乏固定的、多家庭的社区,也就是说没有类似村落这样的固定聚落;同时,也没有超出家庭的世系群,自然也不会有酋长等。虽然在冬天他们会有几个家庭住在一起,但每个冬天所聚集的是不同的家庭,过冬的地点也是每年都不相同。他们有“谁先得就归谁”的财产观念,但却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观念。由于男的狩猎、女的采集,各有所司,所以家庭可以是一夫多妻,也可以是一妻多夫。各家庭的独立性表现在他们没有犯罪的观念,一切恶行都是针对个别家庭而发生的,应由各家庭自行报复,与社会无关。因此,与其说这是在家庭层次上没有社会存在,不如说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社会。通过这个例子,斯图尔德强调文化对生态的适应的研究对了解社会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至今仍有许多学者将此作为田野工作的方法之一。

四、斯图尔德对后人的影响

斯图尔德对后人的影响可以分两方面来讲,一方面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6年,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学生;另一方面是他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影响到一些后续理论的发展。

1946年,当林顿转到耶鲁大学任教后,斯图尔德被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聘用为教授,接替林顿的教授职位。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只有威廉·邓肯·斯特朗(William Duncan Strong)、亨利·夏皮罗(Henry Shapiro)、乔治·赫佐格(George Herzog)、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乔伊·韦尔特菲什(Geue Weltfish)、玛丽安·史密斯(Marian Smith)、查尔斯·韦格利(Charles Wagley)和斯图尔德8位教授,但却有120名以上的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斯图尔德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教书极为用心,修改论文也十分仔细,即使有些学期他不开课,他也要学生到他家开讨论会,尽心尽力地培养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6年,斯图尔德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学生,如佩特罗·卡拉斯科(Petro Carrasco)、斯坦利·戴蒙德(Stanley Diamond)、克利福德·埃文斯(Clifford Evans)、路易斯·法龙(Louis Faron)、墨顿·弗里德(Morton Fried)、安东尼·利兹(Anthony Leeds)、罗伯特·曼内斯、贝蒂·梅格斯(Betty Meggers)、尤金妮亚·费尔南德斯·门德斯(Eugenie Femadez Mendez)、悉尼·明茨、罗伯

参见 美 斯图尔德著、张恭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第49—51页。

同上,第119—143页。

特·墨菲、埃琳娜·帕迪利亚、亨利·罗森菲尔德 (Henry Rosenfeld)、维拉·鲁宾 (Vera Rubin)、埃尔曼·瑟维斯 (Elman Service)、埃里克·沃尔夫等。这些学生毕业后,到各大学任教,并成为新一代美国人类学的中坚。虽然他的这些学生中没有人对文化生态学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却有许多人受斯图尔德的影响,比较注重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在政治经济学或经济人类学方面都有突出的作为,并形成人类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

他的一些学生之所以不太注重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是因为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进化论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没有再继续讨论的必要了。如他的学生墨菲就说:“谁能想象在人类进步历史的大跃进中,会没有适当的技术及经济基础存在?”墨菲认为,文化人类学的下一步工作,应该去研究技术发明的社会以及象征基础等。墨菲的这番话代表了斯图尔德的一代学生们的心声。

尽管斯图尔德的学生们大多不再继续文化生态学的研究,但却有一些学生如斯坦利·戴蒙德、埃里克·沃尔夫和悉尼·明茨等仍和斯图尔德一样坚持唯物主义倾向。沃尔夫和明茨都曾在斯图尔德的指导下参加波多黎各的研究计划,并以此来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这些田野调查与研究使他们认识到,16 世纪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强权国家所带来的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对全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波多黎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殖民主义在那里设立大农场,生产甘蔗及咖啡,使得当地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他们认为这种外来的力量所造成的冲击可能远比自然环境大得多,因而与斯图尔德以生态环境与生计技术的关系来加以阐释的做法有些不同。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虽未被他所教过的学生继承,但哥伦比亚大学仍有一些人如哈里斯 (Marvin Harris)、拉帕波特 (Roy A. Rappaport) 等间接地受他的影响,其中尤以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最得斯图尔德文化生态学说的真传。哈里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对斯图尔德的唯物主义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不感兴趣,因为当时他是查尔斯·沃格利的学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当哈里斯 1955 年再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他已成为一位著名的文化唯物主义者。他承认受到斯图尔德的影响,认为斯图尔德引导了他的同时代人真正地应用文化唯物主义的原则解决有关文化差异和类似的问题,自己的文化唯物主义就是在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哈里斯所倡导的文化唯物主义是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前提上——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他说,文化唯物主义的主要原则就是客位行为的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必然地决定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又必然地决定行为和思想的主位上层建筑。为简洁起见,可以把这一原则称为基础结构决定论的原则。从这个基本立场来看,哈里斯的思想与斯图尔德的思想相当接近,只是哈里斯更明白地讲出“技术——环境及技术——经济(及人口)决定论”而已。这表明哈里斯与斯图尔德一样,都重视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他们都重视导致社会文化现象发生、发展的原因,并都从环境、技术、经济、人口等方面去寻找解释的根由。因此,可以说文化唯物主义是在文化生态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理论。

另一方面,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由于拉帕波特等的努力,文化生态学朝另一个方向发展

参见叶春荣:《文化生态学的倡言人——史都华》,载黄应贵主编:《见证与诠释》,第 199—200 页。

Robert F. Murphy, "Anthropology at Columbia: A Reminiscence", in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16 (1), 1991, p. 75.

参见 美 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第 65 页。

了。拉帕波特的研究对象是新几内亚的策姆巴加人 (Tsembaga), 并以此研究而著名。策姆巴加人的耕作方式是刀耕火种, 主要种植芋头、蕃薯等块根植物。他们也养猪, 但养猪并不完全是为了满足获取蛋白质的需要。白天他们把小猪放养出去, 晚上才让它们回家吃剩菜、蕃薯等。小猪在野外跑来跑去拱土觅食, 有助于把菜园的土弄松, 好种植庄稼; 吃剩菜等也可以帮助保持环境清洁。可是, 当小猪慢慢长大后, 剩菜、蕃薯等已不够喂食, 策姆巴加人得专门为猪准备食物。由于蕃薯等块根作物是策姆巴加人的主食, 因此这时就变成了大猪与人争食。而且大猪还会把别人的菜园踩坏, 导致菜园的主人常把闯入菜园的大猪杀掉以示惩罚, 这又可能导致猪的主人把菜园的主人或其太太或是他们的猪杀了作为报复, 引起连锁反应。为了避免血债, 策姆巴加人就尽量避免自己的猪跑到别人的菜园里。此外, 策姆巴加人的村落之间常处在非战争即和平的状态下, 如果两个村落交战, 胜利的一方往往把失败者赶走, 把他们的房子烧光, 猪也被全部杀掉。如果到交战结束时, 一方没有被对方赶走, 他们就把大猪全部杀掉来祭祖、宴客, 请所有曾来帮忙打仗的盟友吃猪肉。拉帕波特认为, 这种仪式性的杀猪虽然很浪费, 但却起到平衡整个生态体系的作用。因为大猪与人一样都要消耗蕃薯等食粮, 猪虽然为策姆巴加人提供了必要的蛋白质营养, 同时猪也和人们争食, 并与人类的纷争、生态的平衡息息相关。人类也是整个自然生态体系的一部分, 需要用社会文化的手段与生态环境保持一种平衡关系。

由此可见, 拉帕波特的研究已从环境如何与生计技术一道塑模人类社会文化的结构与发展, 转变为如何维持社会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了。拉帕波特等人的观点与斯图尔德的基本差异在于对生物生态学的态度不同。斯图尔德在生态学前加上“文化”一词, 就是认为文化生态学有别于生物生态学。而拉帕波特等人则试图把生物生态学的一些原则融进文化生态学中, 使其成为一门单一的生态人类学。他们认为, 文化特质就如同生物特质一样, 可以从适应或不适应的角度来考察。文化人类学下的生态人类学的基本假定之一是: 在谈论文化适应时不能离开自然选择的理论。也就是说, 他们强调的是自然选择, 适者生存, 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同样会影响到个人和群体的发展, 从而与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有一些差别。

(石奕龙, 教授,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罗 葳)

参见 Roy A. Rappaport, *Pigs for the Ancestors*, N. H.: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参见叶春荣:《文化生态学的倡言人——史都华》, 载黄应贵主编:《见证与诠释》, 第 199—205 页。